

王维“变奏”心态与隐逸

王可欣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摘要：大唐时代背景以及王维个人体验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政治心态也随之发生了曲折变化。王维“变奏”的心态变化也促使了王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隐居行为。本文将以王维一生的“仕隐”之变为切入点，再辅以诗文之证，抓住王维政治心态变化的基本线索，准确把握王维的隐逸思想。

关键词：王维；变奏；政治心态；隐逸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1.153

一、引言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根据史料记载推测，王维一生共约发生四次隐居，分别位于淇水、嵩山、终南和辋川，然而王维每次隐居的结果大都为再次出仕。从王维一生的仕隐状况来看，王维的隐逸思想总体呈现出时弱时强的“变奏”特征。这种“变奏”思想的变化与王维当时的政治心态变化以及王维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在政治清明时，王维性情直率，政治热情高涨，即使被贬，仍未表明隐逸的态度，而是寻求“终南捷径”。在经过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擅政后，隐逸思想随之“变奏”发展，王维的心态逐渐“老化”，虽仍怀报世救国之心，但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心灵慰藉，选择“富贵山林”之路。

二、客观因素对王维“变奏”心态及思想的影响

（一）盛唐之衰，安史之变

盛唐时期充分展示大唐雄风，国富民丰。唐代士人意气风发，充满热血。青年王维也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将用世之志全然展现出来。

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年仅十九，进士擢第。后被贬济州，官于淇上。王维报国之心未灭，为寻求“终南捷径”，于王都附近，嵩山一带广为交游，这些看似“隐逸”的行为其实都是青年王维期望得到宗室权贵举荐以求为国效力的表现。

王维自仕进后，宦海沉浮，王维“变奏”心态由此产生。而“安史之乱”更是王维“变奏”心态转变的重要节点之一，“安史之乱”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爆发，此后八年，王维有过短暂的乱离生活。动荡的时局以及飘零的孤苦之感，使得王维的心态渐渐“疲惫”。“负国偷生”的悔恨以及报世救国的志向使得王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最后选择一条“富贵山林”的自适之路。

（二）世家少年，才华卓著

《旧唐书》本传记载：“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王维的母亲笃志奉佛，王维的名与字就取自《维摩诘经》。王维母亲尊佛奉佛的态度对王维晚年“以玄谈为乐”“以禅诵为事”的生活文化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维出身世家，得世家培养，又加上自身自幼聪颖，“九岁知属辞”，还工于草隶，喜爱丝竹音律，擅长绘画，是个风流才子。开元年间，王维诗名大盛，“豪英贵人，虚左以迎”，这为王维走仕途奠定了基础，也是王维“变奏”心态的“前奏”。

正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象征最高封建集权的京都，亲眼目睹了上层贵族荒淫腐朽的情景，也亲耳听到了穷苦百姓惨痛凄苦的呼喊以及那些空怀才学而不被重视的有识之士发出的悲叹，所以王维才写出一些思想内容深刻的作品，如《息夫人》《洛阳女儿行》等。

（三）三教融合，文化底蕴

唐代，儒、释、道思想相互争斗又相互融合，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逐渐调和。这种现象对当时士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王维的“变奏”心态与隐逸思想也离不开儒、道、佛的浸染。

王维前期由进士科入仕，显然是受儒学“积极用世”思想的影响，提倡“选贤举能”，常常为那些饱学之士却报国无门的寒门子弟发声，批判那些不劳而获的勋贵豪门，如《偶然作》《济上四贤咏》。

盛唐时代，道教流行，追求长生成了一种时代风气，王维也受其影响。如《过太乙观贾生放》便写了自己“攀林”“采药”的求仙经历。

王维后期已经达到了一种佛、道兼修的境界，所以在他的诗文中，“空”“无”“静”等字常常出现，用

一些看似平淡却蕴含深意的语言阐述佛道精粹。

三、王维“变奏”心态与隐逸思想的发展

(一) 志足意满，径情直遂

开元三年至开元九年，王维奔赴长安，解褐太乐丞。这期间，王维政治热情高涨，主要政治心态是积极求仕。所作大部分诗歌声调高朗，气魄宏大。因为盛唐大气磅礴的时代渊源以及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渗透了王维前期的政治心态，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体现在他的政治感遇诗及送别诗上。

王维的送别诗不落俗套，在送别友人时，往往不显黯然神伤的心绪，而是借此鼓励友人，让友人不要放弃报国之志，充分展现出盛唐士人意气风发的气概。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一诗，是诗人鼓励有才贤士积极投身科考之作，也是为了鼓励好友綦毋潜振作精神，规劝他打消归隐的想法。

王维不论在长安，还是被贬，都不掩盖自己的直率性情，常常揭露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通过直抒胸臆、比兴寄托等手法来控诉社会的不公，表达自己的愤慨不平。如《洛阳女儿行》中，前文极写女子的娇奢，最后却以浣纱女作结，通过贵族女子与浣纱越女的强烈反差对比，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王维对贵族生活以及社会不公现象地批判。

此外，将王维的边塞诗和高适、岑参的诗歌比较时，也毫不逊色。主要用于赞美边塞生活的壮美，并表达建立军功的豪情壮志。如《燕支行》中写道：“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又愁。”此诗描写武将出征获胜的情景，极力表现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报国之志。

从以上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维此时正处于政治热情高涨、踔厉奋发的时期，其隐逸思想尚未显现，甚至是毫无东山高卧之意。

(二) 时乖运拙，弹冠振衿

开元九年至开元三十五年，王维便发生了两次隐居：淇水和嵩山。王维在政治上受到了第一次挫折，这时期王维的政治心态特征主要是暗淡无奈和渴求汲引。

王维少年进仕，意气风发，但是在他封为太乐丞后不到半年，就被贬到济州为司仓参军。仕途上的打击对王维的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仅对仕途感到愤懑与失望，更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无措。以至于后来王维在《被出济州》中抱怨：“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不过正因诗人在贬官期间遭遇的种种不公和黑暗，才使得他对社会政治的阴暗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渐渐萌发了归隐的想法。

开元十六年，王维辞官于淇上隐居。虽然过着“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的悠然生活，但是王维的用世之心并没有消磨殆尽。正如《不遇咏》一诗，表明王维虽然隐居山水，但还是密切关注时事。在诗中结尾向世人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为人之道：先济世经邦，然后功遂身退，去过闲适的自在生活。诗人虽然处鸾飘凤泊之境遇，但仍然能抒发如此豪情壮语，可见王维心中仍然有强烈的用世要求。

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拜相，次年五月又加中书令。王维以为终于有机会展示才能，便赶赴洛阳求汲引，后献诗于张九龄。在等待期间便于嵩山一带隐逸交游，但这次隐居不是因仕途失意，而是为了寻求“终南捷径”，为出仕做准备。

开元二十三年，王维官拜右拾遗。王维给张九龄写了一首言志诗《献始兴公》。诗人借对张九龄正直无私精神的颂扬，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表达了自己渴望得到提升的心绪。

可见此时王维的政治心态仍以积极用世为主，隐居只是王维调节自己因仕途失意而愤懑无奈的情绪所做出的暂时寄情山水的行为。

(三) 一丘一壑，山情水意

开元二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六年间，王维遭遇了政治上的第二次转折，随后便在终南山隐居，自此开始了亦官亦隐的“富贵山林”之路。这时期，王维追求功名遂的积极用世之心渐渐暗淡，后陶醉于山水田园之间。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卸任，李林甫揽权执政，朝政渐趋昏暗。诗人对张九龄被贬一事感到沮丧、激愤却又无可奈何。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一诗中便诉说了对张九龄的深切怀念之情，同时也流露出零丁孤苦之感，暗含自己隐居山林的心志情怀，期望通过奉佛隐居让自己“身心适意”。

开元二十九年春，王维谒璇禅师。在《谒璿上人》诗中，王维表明了自己“不复婴世网”的决心。开元二十九年，王维归长安后，于终南山隐居。这期间王维的心态是飘然淡逸的。关于王维《送别》一诗，笔者更倾向于将此诗解释为诗人自问自答的感怀诗。在诗人自问自答的过程中，短短“不得意”三字，就道出了自己心中的郁抑不平。诗人在自己有隐居终南的想法后，不但不加以制止，更是对自己的想法给予了自己肯定。在王维心中“功名利禄”皆是有限之数，唯“白云”，即山水田园中意趣无穷无尽。这首诗言约旨远，既包含对

自己的劝慰，也表现对不公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以上所述，可证诗人隐于终南的行为，主要是受其政治心态影响。感知了政局的昏暗后，诗人自知凭一人之力无法改变什么，便遗弃人世，隐逸山林。

（四）无可亦无不可

诗人隐于终南仅一年时间，便再次出仕，随后就于辋川“半官半隐”，而后又遭遇安史之乱，此时的王维已然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了。王维在某个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诗人。纵观其一生，少有“金刚怒目”之行止。虽然在少年和中晚年时期，王维都有对社会的平不现象表达自己的愤懑。但是当事情发生时，他却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

在杨国忠专政时期，王维由于不敢得罪李、杨而选择妥协，选择了“半官半隐”。《赠从弟司库员外綵》就是此时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在李、杨掌权期间数次升官，仕途并没有失意。所以他选择“半官半隐”的方式，不是因为晋职困难，只是因为他对强权的害怕畏惧。为了避免受到政事上的连累报复，软弱的性格使他向权势低头。

王维于《与魏居士书》中提出“无可无不可”的理念。这种理念正是他性格中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他认为“适意不适意”全然是一种主观感受，只要是“身心相离，理事俱如”看透现象与本质，那么无论是仕与隐都不会不适意，不必要固执于“餐松饮涧”的隐居环境，在朝为官亦为道。

大多学者认为王维后期的心态是颓唐消极的，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王维的赎罪心态占主导。笔者虽赞同王维晚年的赎罪之心，却不赞同王维晚年消极迟暮的心态，王维晚年时期的用世之心并未死寂。

王维的痛苦与愧疚在《责躬荐弟表》中尽数展现：“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王维将“负国”之罪安于己身，这种深厚的赎罪心态对王维后期的政治态度造成巨大的影响。我们从“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等诗句中可以推断，王维在“半官半隐”期间长时间待在京城处理政事，并没有时常往来于辋川别业，否则诗人在临行前不会有如此浓烈的惜别之情。

王维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的隐居行为，其实是一种宽慰自身以寻求自适的隐，自然山水田园对于诗人来说是休闲时欣赏游玩的处所，是精神得到放松的栖息地。

五、结语

纵观王维一生的仕隐之变，仕途坎坷起伏，心态起起落落，其隐逸思想也随之“变奏”流动，王维于官场起伏间，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隐”的思想与内容逐渐发生变化和转移，逐渐从社会朝堂走向山水自然，而王维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所以诗人在不断尝试后，选择了“亦官亦隐”的生活，于“富贵山林”中，寻找心灵的慰藉。知其人，论其世，诗中真意才可以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 [1] 陈再文. 皓然出东林, 发我遗世意——浅谈王维诗中表现的隐逸思想[J].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3): 8-9.
- [2] 徐伯鸿, 余德. 略论盛唐气象与王维心态[J]. 平顶山师专学报, 1999(2): 30-33.
- [3] 梁志刚.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J]. 前沿, 2008(9): 179-182.
- [4] 谭朝炎. 王维性情及其隐逸[J]. 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4): 54-57.
- [5] 杜莹. 文化视域下的仕与隐——王维的心态及诗风嬗变[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6): 14-16.
- [6] 金五德. 一位正直而软弱的诗人——王维心态探微[J].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1): 91-96.
- [7] 赵雅娟. 由“任真适性”到“身心相离”——从创作心态看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之不同[J]. 汕头大学学报, 2006(2): 43-45, 50, 97.
- [8] 彭广明. 论王维心态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J].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09(7): 248.
- [9] 赵子抄. 陶渊明和王维隐逸思想比较[J]. 大众文艺(理论), 2009(4): 143-145.
- [10] 盛誉, 倪海权. 王维诗歌与“少年精神”[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
- [11] 田艾灵. 王维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 [12] 胡果雄. 王维的精神世界[D]. 湖南大学, 2013.
- [13] 何瑾. 佛心诗意——王维与终南山之研究[D]. 南昌大学, 2012.
- [14] 孙乾. 王维隐逸思想中的审美意识研究[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7.
- [15] 张潭. 王维诗作隐逸典故研究[D]. 曲阜师范大学, 2017.